

# 序一

## 一個人的文革史

方方

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 一

文革開始時，我上著小學四年級，正處於那種有記憶能力而無行為能力的年齡段。整個文革，我幾乎都只是一個看客。我所居住的樓房，有一個頗為寬大的半敞開式走廊。樓上四家人，除去正處於飽受衝擊的大人(全是工程師)外，共有十一個學生，九男二女，年齡相差九歲。最大的是我大哥，他已上大學，最小的便是我。九個男生中的七個中學生，均被捲入了文革，幾乎每個人都參加了相應的組織。他們白天出門，晚上便坐在走廊上高談闊論。我則是一個忠實的聽眾，像聽故事一樣，聽他們講述外面發生的事情。所有的武漢文革中出現的大事件以及著名的人物，我都清清楚楚。因我的兄長和我的鄰居都屬成份不好的人，他們參加的組織，幾乎都是造反派。為此，對於當時造反派的一些領軍人物，我亦瞭若指掌，魯禮安便是其中的一個。兄長們在七嘴八舌講述魯禮安以及他書中多次提到的馮天艾等人的故事時，都帶著崇敬的口吻。關於他們叱咤風雲的文章，他們口若懸河的演講，他們振臂高呼的激情，都彷彿令我親眼所見。如此這般，魯禮安這些老紅衛兵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這個少年聽眾的偶像。蓋因為有此經歷，當我得知魯禮安寫了一本回憶錄，希望我能為他寫序的時候，竟是嚇一大跳。我的第一反應便是：我怎麼敢？我來為他寫序豈不是太狂妄了？

但是最終我還是決定要寫。不是為了別的，而是因為對於文革實在是有太多的話要說。

## 二

關於文革的被人遺忘，三年前，我曾經在我主持的雜誌上寫過這樣一篇「社評」：

文化大革命已經遠去我們二十五年了。突然之間，原本近在眼前的它、清晰可見並且帶著鮮血的它，竟成了遙遠遙遠的往事。那些受傷至深的人都已然老去，許多的他們業已或是正在告別這個帶給他們無限傷感和痛楚的世界；跌跌撞撞地與這段歲月共同進退的中年人們則努力地想要忘卻，因為他們的生命時日無多，只有向前才能看到希望，而回過頭去則總是只能看到自己廢掉的一截青春，徒增傷悲又有何益？至於那些年輕的人們，記憶裏幾乎沒有文革。無數殘酷的歲月在他們童年的記憶中淡得幾乎沒有痕跡，倒是許多天真無邪的歡樂卻鮮活鮮活地存在於腦海。更小更小的人兒，文革的一切對他們只是傳說中的傳奇，有如一部金庸小說，雖然充滿悲歡離合和刀光劍影，卻只是讓人津津樂道，無論如何也引發不了一絲痛苦的感覺。

十年慘烈的浩劫，十年幾乎讓中國人民崩潰的災難，在紙醉金迷的今天，彷彿只是一段陳舊的歷史故事，是逝去的老人們墳前的一疊錢紙，是無數飯店酒館的餐桌上的一杯老酒，是年輕的白領們的幾聲俏皮笑。連對它的牢騷，人們都快聽不見了。

但是，它卻是實實在在地存在過。它是那樣深刻地影響過我們的生活，它甚至顛倒了我們的思維，扭曲了我們的眼光，改變了歷史的進程，重塑了民族的靈魂。它走得是那樣深那樣遠，其實直到今天，它的陰影也沒有完全地消失，它的毒素滲透在我們的骨髓之中，只是我們都不想承認罷了。

無論如何，文革是一段不該也不能忘卻的歷史。只是人們（包括歷史學家）對它的研究還遠遠談不上深度。簡單地控訴它清算它以及批判它，在二十五前雖然必要，在二十五年中也還可以，但在二十五年後的今天顯然就不夠了。對於它的成因，

它的根源，它的偶然，它的必然，它的背景，它的時況，它的初衷，它的走向，它的失控，它的專制，它的個人恩怨，它的民間情緒，它的體制問題，它的宣傳導向，它的文化程度，它的封閉視野，諸如此類，在今天都應該重新思過。否則，我們的後代甚至連我們自己也不好理解，怎麼幾億人一夜之間都跟瘋了一樣，而且一瘋就是十年，瘋得沒個譜。

那麼理智地冷靜地看待文革，並分析它反思它徹底清算它，以便將來不再發生這樣的事件就實在是太有必要了。

我們編輯部一直想要做一組稿子，來深入地探討文革，但這樣的事，顯然不是幾個人或是一個小小編輯部所能擔負得了的。因此，我們覺得這樣的事情還是交由專家們來做，而我們則索性開設一個史料性的欄目，請各方人士尤其是文革中一些事件的相關人士來談文革中他們的所為，或許這樣的原始史料，對於我們瞭解文革，對於專家們研究文革，對於讀者們看清文革，會有好處。

這本雜誌終於也為此付出了被勒令停刊的沉重代價。

我將之引用在此，是因為事隔三年，我突然覺得，文革式的做法，文革式的思維，文革式的專制，文革式的人治依然在許多的地方左右著我們的生活，干擾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那些不該遺忘的內容，卻以加速度的方式被實施遺忘。

### 三

現在我要說魯禮安和他的這本書了。

在文革中，大多大多的人都只是芸芸眾生，他們的個人行為只與他們自己相干。而魯禮安卻不是。應該說，魯禮安是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之一，因為他在這場浩蕩的大革命中，不僅是追隨，還有製造。他暢快淋漓的文章、唇槍舌劍的辯才、揮斥方遒的意氣、俠肝義膽的豪情，曾經成為武漢三鎮的傳奇。正因為此，當傳出他被抓獲的消息，竟引發一場規模不小的「營救」運動。無論今天我們如何評價當年，無

論事情的發生發展是對是錯，對於魯禮安而言，那都是他個人最轟轟烈烈也最風光無限的年月。

只是好景不長，魯禮安最終被投入了牢房。雖然關他入獄的理由現在說起來像個笑話，但他卻因為這個笑話，在不時轉換但全都黑暗的小屋中度過了近十二年的時光。21歲到33歲，一個人幾乎全部的青春都被永遠塵封在此並且永遠也索取不回。曾經與魯禮安一起「革命」並也坐牢的諸多戰友或死亡或崩潰，但魯禮安卻沒有。這應該是個奇跡，連魯禮安自己也認為是個奇跡。或許是他的充滿自信的性格幫助了他。他在獄中一遍遍回憶自己的往事，以致那些事情爛熟於心，睜眼閉眼都清晰可見。那時候，他就下決心要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書。

這一天終於到來。雖然這時候，距他走出監獄的那天業已又過去二十五年。

這是一本重要的書，重要的不僅是內容本身，而是魯禮安所做的這件事。十年的文革時間，實在是太漫長了，漫長得我們無法看清它的真相。隨著二十八年時間的推移，這原本就不清晰的真相更是越來越色澤模糊，越來越眾說紛紜，越來越是非難分，越來越錯綜複雜。究竟是什麼原因令中國產生如此之大的浩劫？是什麼理由使中國精英們一夜之間以排山倒海的姿態崩潰？是什麼力量讓陽光一般的紅衛兵突然成為人們眼裏的惡魔？……這樣的問題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但答案卻總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當然，這樣的問題，魯禮安一個人的回憶錄不可能解答，就算有其他更重要人的回憶錄也無法解答，它需要千千萬萬過來人最真實的記憶。文革若是暗夜裏的一塊巨石，渾然不見它的真實面目，而魯禮安的回憶錄便是一隻射向它的手電筒。雖然它只能讓我們看到巨石的一個點，但如果有無數無數的魯禮安將自己的文革經歷寫出來，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身分地位相對特殊的人寫出自己的文革歷程，那麼，這就如同手電筒從各個角度向這塊看不清的巨石投射去光照。聚光之下，就算最本質的東西無法觸及，但它的輪廓卻已然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或許這樣，我們方能以最快捷的方式接近真相。

其實，對於文革，我個人以為，真相比結論更加重要。這就是三年前我非常希望看到回憶文革的原始文本的原因。

這樣，魯禮安的回憶錄應該是開了一個好頭。這是他一個人的文革史，畢竟他真正投身這場運動只有區區兩年時間，餘下的日子他都在單人牢房裏度過。那是他最黑暗最艱難的時光。縱是歷經了如此深重的苦難，在魯禮安長達幾十萬字的行文間，我們竟然仍能看到他革命浪漫主義的情懷，竟仍然能感觸到他當年的激情和亢奮。或許他字裏行間激昂有餘，沉重不足；或許他對自己的寬容和諒解多了些，自責和反思少了些；或許他在描述有些人時帶有個人感情色彩，而缺少一點通達和客觀，諸如此類。但不管怎麼樣，他將一個人在文革中最真實的經歷和最真實的心態都展示在我們的面前；他讓我們看到一個時代的風雲動盪與荒唐不堪；他讓我們為一個年輕人曾有過的命運、為許多年輕人曾有過的命運、為我們國家和民族曾有過的命運扼腕歎息。他的曲折而痛苦的經歷，喚起了我們以及更多人想要透徹瞭解文革真相的欲望，也將會喚起那些文革過來人願將自己的見聞和經歷寫出來的勇氣。

應該說，這就是魯禮安這本書的意義所在。

## 序二

# 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

姜弘

武漢市江漢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三十年，我才讀到第一本完整的個人回憶錄，而且這樣真實生動，把人帶到了在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思議的那個瘋狂的年代。我原來曾想，文化大革命是無法如實描述的，因為那一切太離譜，太不正常了，真實的不正常有可能成為漫畫，使人感到荒誕。然而，讀了魯禮安的這本書，我改變了看法。也許因為我是過來人，而且曾參與過有關活動，所以讀時如同回到了當年，一切都重現眼前，感到真實而親切。這種真實感來自作者的真誠，他**不加矯飾**地把當年那種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照原樣再現了出來。說幼稚也好，說愚昧也好，或者乾脆說奴性也好，當年確實就是那樣——魯禮安給了我們一塊「文革」的活化石。

「文革」中武鬥頻繁，死傷無數，實際上已經演化為一場「武化大革命」。魯禮安的獨特之處，在於他自始至終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雖號稱「敢死隊」，實際上他一直沉浸在邏輯和激情之中，所進行的是思想理論上的戰鬥。他那種理想主義傾向，他的辯才和勇氣，吸引了許多右派。我和我的右派朋友常在私下裏議論他，稱讚他，因為我們從他身上彷彿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

在「文革」之初「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我和我周圍的幾乎所有右派，包括老作家姚雪垠、李蕤，詩人徐遲、白樺、王采、秦敢，翻譯家章其，著名法學家韓德培，著名記者趙鎔、劉若等等，都受到了猛烈衝擊，成為游離於鬥爭旋渦邊緣的「死老虎」。事實上，當時我們都已成為俎上之肉，隨時隨地任人侮辱摧殘。是爭取生存權和對民主的渴望，使得一些右派利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機會，介入了「造

反有理」的活動。最突出的是公開站出來造反的詩人白樺，他在1967年夏天以「一個解放軍戰士」的名義創作和散發的組詩《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充分反映了造反派群眾那種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意願和激情。這些詩被抄成大字報貼遍武漢三鎮，傳頌一時，膾炙人口。徐遲對這些詩評價很高，他伸出拇指說：「全國文藝界頭一份！」

老作家姚雪垠也並未完全置身事外，而是以曲折隱蔽的方式表示對造反派的支持。1967年春天，造反派被鎮壓，軍區發佈《三·二一通告》，取締工人造反組織，把學生從《長江日報》的紅旗大樓趕走。一時間，武漢三鎮一片沉寂。對此，姚雪垠懷著悲憤的心情，一連寫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詩，並加了一個小序，油印成小冊子，偷偷散發出去。小序稱：「三·二一」以後，紅旗大樓前人迹寥寥，大字報全被撕毀，紙屑飛揚，一片淒涼。他於無意間發現海關大樓旁有一組小字報，直行書寫，雖已殘破，尚可辨認，竟是一組七言律詩，而且格律謹嚴，對仗工穩，因而不忍任其湮沒，擇可識者抄下云云。記得第一首裏有一聯是「武漢關前月色冷，鐘聲寂奏東方紅」。中間有一首更把這一年的三月二十一日稱為「新馬日」（指1927年5月21日湖南軍閥何健在長沙鎮壓革命工農群眾的「馬日事變」）。由此可以看出我們這些人當時的思想感情傾向。

當年有一種說法，說右派「人還在，心不死」，這話其實並沒有錯。他們所說的「心不死」無非是講嚮往「民主、自由、人權」之心不死，而這正是五七年的右派和「文革」中有「異端」傾向的那部分造反派所追求所夢想的。我和我的朋友們注意並讚賞魯禮安和他的《揚子江評論》、《北斗星學會宣言》，是發現他們抓住了當代中國的兩個最重要也最敏感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正是1957年「鳴放」中的關鍵問題，這就是實行民主和解放農民。當年在武漢大學的大字報欄上就有這樣的醒目大標題：「爭民主，爭人權！」、「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魯禮安他們呼喚巴黎公社原則，關心農民的現實處境，把這兩個問題聯繫起來了。

當時對於他們的這些思想和主張，我和我的朋友們是贊成和佩服的。但同時又為他們擔心，感到他們已闖入了禁區。他們不知道，我們當年就是在這些問題上犯禁而罹難的。魯禮安不知道，巴黎公社式

的民主，是只可以說而不可以做的。當時，姚雪垠就看出了這一點，說他的思想很危險，會吃大虧的，要我千萬不要介入他們的活動。儘管如此，包括姚雪垠在內的我們這些人，還是非常同情、讚賞魯禮安並為他的命運擔心。如前所述，因為我們從他身上看到了我們當年的影子。面對魯禮安們的「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像我們這些歷盡滄桑的「右派分子」，自然都會在內心裏產生感應，聯想起過往的歲月——從心裏產生「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的感慨！

1957年的「鳴放」，是一次夭折了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五四精神的一次回光反照。當時提出的問題既深且廣，與「文革」中那場造反運動的不同是很明顯的：一是性質不同，二是思想資源不同。表面看來，「鳴放」與「造反」都是「響應號召」，又都是中了毛澤東的「陽謀」。但二者有重要區別：右派是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和主張而為毛所不容，才「因勢利導，聚而殲之」的。造反派則不同，他們對毛無限崇拜、無限忠誠，是被愚弄、利用之後又被拋棄的犧牲品。說到思想資源的不同，主要是歷史環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裏不僅有社會民主主義，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觀念，這與他們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關。造反派就沒有這種精神資源，他們生長在嚴格封閉的單一思想文化環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種意識形態，就是「毛主席的教導」，就是林彪為《毛主席語錄》題詞時所書寫的那幾句雷鋒日記：「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一句話，就是聽話，效忠！人們當年就是愚蠢地唱著「忠字歌」、跳著「忠字舞」，滑進那個瘋狂的年代的。

我們對魯禮安們的讚賞，歸根結底，就在於他們在那個全民瘋狂的年代裏，保持了一份難得的相對清醒。這正是他們與一般造反派的不同之處，也是他們難能可貴之處——因受壓而反抗，而獨立思考，從而衝破思想禁錮，從毛澤東走向馬克思，反過來質疑現存制度，而且不顧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自己組織起來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他們當然沒有想到，這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就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然而，正是在這裏，他們遇上了1957年的右派，他們之間的思想觀點相近，精神上相通，而且這種相近、相通的東西一直延續到1989年。可惜的是，這種相近、相通之處



未能相互傳承，積累發展，並上溯到五四源頭，進行認真的研究總結。

如今，這一切都過去了，成為歷史了，但是「文革」中有許多的真假是非問題並未弄清楚，人們還沒有把「文革」中的施暴者與受害者區分開來，魯禮安的這本書有助於解決這一歷史公案。書裏有一個附錄，注明了有關人物的基本情況，那些曾經為武漢人所熟悉所關注的活躍人物，那些造反派頭頭，不是悲慘的死去，就是淪落到了底層。——前兩年我曾在街頭遇見當年和我一起辦報的「中學紅聯」的小劉，那個精明活潑的中學生，如今已是個形容憔悴的中年人，正在為下崗後的生活而奔忙。是他認出了我，我卻認不出他了。當時，我不由得聯想到魯迅筆下的潤土，心裏戚戚然無言以對……

這樣的人很多很多——「八九點鐘的太陽」，火樣的青春，被愚弄、被利用、被毀滅了，反轉來又要承擔沉重的歷史罪責，這也未免太不公平了。當然，問題不僅僅在於此，歷史的發展總是要有人付出代價，作出犧牲的；問題在於，是用這沉重的代價掩蓋歷史真相，還是用以換取真正的歷史教訓？魯禮安的這本書既是不平之鳴，更是揭示歷史真相，提供第一手可靠資料。至於反思、懺悔、評判，那是以後的事。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魯禮安這樣，將自己曾經參予其中的那段歷史，認真地回憶並如實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讓我們的子孫知道他們的前輩，曾經生活在一個怎樣黑暗恐怖、虛偽荒唐的時代。這件事是要抓緊做的，不能以人老了，記性不好了，容易「健忘」來敷衍。歷史不能遺忘，也不准許遺忘。忘記了過去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忘本和背叛。那樣我們將愧對歷史，愧對我們的子孫。

二零零四年中秋之夜於武昌東湖